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9期（民國109年9月），139-14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lif Akçetin and Suraiya Faroqhi, eds., *Living the Good Life: Consumption in the Qing and Ottoman Empir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2018. 573 pp.

仇乙彤*

本書由 Elif Akçetin 和 Suraiya Faroqhi 主編，收錄 16 篇研究鄂圖曼帝國和清朝中上階級消費文化的論文。自 Neil Mckendrick 提出消費革命（consumer revolution）及 Jan de Vries 用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理論來解釋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歐美學者已將消費作為一項重要研究課題，他們發現消費不僅反映了社會經濟水平，還反映了文化網絡，乃至民族身分認同。[1]不過傳統西方學界認為東方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並未形成消費風氣。[2]然而此一結論缺乏對現有歷史材料的全面分析，也未涉獵更廣泛的地域差異。在近三十年的消費史研究中，就有不少針對特定商品、地域或社會階層消費風氣的佳作試圖

* 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生

1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eds.,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2); 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16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4; Maxine Berg and Helen Clifford, eds., *Consumers and Luxury: Consumer Culture in Europe 1650-185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T. H.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2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5;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m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4.

反思這一觀點。[3]在二十一世紀東亞經濟崛起後，東方消費史和全球比較的研究逐漸增多，但深度和廣度兼具的著作仍然甚少。

本書主編在本書以論文匯編的形式，全面而深入地討論東方兩大帝國的消費文化，選擇鄂圖曼帝國和清朝進行對比亦非偶然。加州學派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率先提出清朝經濟發展並非如想像中落後，此後其他學者也開始重新審視過去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逐漸將歷史學科去殖民化，東方社會如清朝、鄂圖曼、印度等國家也日漸受到重視。著名學者 Şevket Pamuk, Suraiya Faroqhi, Robert Brenner, Mehmet Genç, 三浦徹，還有關本照夫等人，深入探討鄂圖曼帝國的農業、商業、法律以及政府結構，並考察該政體與西方及中國的差異。[4]與清朝相關的研究更是百花齊放。

本書主編 Suraiya Faroqhi 爲鄂圖曼經濟社會史家，Elif Akçetin 則是研究清朝社會生活的專家。兩位主編在序言中提到，在全球各大學院校，教授「世界史」已經成爲了一種新常態。現在人們對於非西方文化的研究興趣大大提高。鑒於中國製造的消費品之重要性，與鄂圖曼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熱愛，將鄂圖曼和中國兩相對比消費頗合乎時宜。他們倆位認爲十八世紀時，兩大帝國均無較大的動蕩，社會也較爲富裕，因而選擇匯集研究該時段的論文（頁 IX）。

本書否定農耕社會沒有消費風氣的觀念，提出兩個社會均有消費文化，且受政治與經濟因素影響頗深；兩國不僅有複雜的消費模式，消費奢侈品亦成爲爭取利益的方式。儘管書中收錄的部分論文僅爲個案研究，但已觸及消費的各

3 Hsu Wen-Chin,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Chinese Porcelain Industry in Jingdezhen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Ca. 1620-1683,"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120:1 (1988), pp. 135-159; Carol Benedict, " Introduction,"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1-14;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7）；黃敬斌，《民生與家計：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4 Eren Duzgun, "Property, Geopolitics, and Eurocentrism: The 'Great Divergenc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50:1 (March 2018), pp. 24-43.

個面向；作者們不僅受到全球史興起的影響，方法上也受到跨領域研究及量化經濟史的影響。此外，作者們利用多種史料，除了內務府檔案、抄家清單、筆記小說、遊記外，還別開生面地使用了偷竊紀錄、當鋪指南等資料。各章作者皆爲研究清朝和鄂圖曼歷史的佼佼者，他們一方面企圖開發新穎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嚴謹看待材料的侷限性，同時更廣泛又深入地檢視近年社會經濟文化史研究的論點，從而有力地證明十八世紀兩帝國中上階級皆擁有較高的消費水平，使本書在東方消費研究領域得以有所突破和更新。

本書的觀點與東亞學界如傅衣凌、吳承明、樊樹志、巫仁恕等人提出的明清消費經濟轉折理論相仿。傅衣凌指出在明代中葉以後，經濟上具備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因素，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活潑、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5]著重研究消費風氣的吳承明、樊樹志和巫仁恕等人也得出相似的結論。[6]巫仁恕從多個角度入手，研究了晚明士大夫的奢侈品消費風氣、明清婦女消費風氣、江南旅遊活動、清朝的惜字運動等等，[7]一再證實明朝中葉之後奢侈品消費文化的盛行。日本學者森正夫和岸本美緒也對明末清初的奢侈之風進行研究，發現社會原有以「鄉紳」、「士大夫」爲上層的秩序逐漸被顛覆。[8]而在鄂圖曼帝國方面的研究，雖然 Selim Karahasanoğlu 的專文用一位大維齊爾（grand vizier, 相當於宰相之職）的收支數據，證明鄂圖曼高官並不一定像過去史家

5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01。

6 吳承明，《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30-50；樊樹志，〈江南市鎮的民間信仰與奢侈風尚〉，《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5 期，頁 107-116。

7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7）；《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05）；《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8（2002 年 12 月），頁 1-71；〈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爲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1（2003 年 9 月），頁 87-143；〈士、商文化的衝突與調和——從廣告字紙看清代消費社會與文化史之一面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0（2018 年 6 月），頁 1-45。

8 森正夫，〈明末の社會關係における秩序の変動について〉，收入森正夫，《森正夫明清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6），冊 3，頁 45-84；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観〉，《古代文化》，卷 48 號 2（1996 年 2 月），頁 55-63；岸本美緒，〈「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卷 13 期 3（2002 年 9 月），頁 1-20。

所描繪的那樣奢侈無度，但書中收入的其他文章仍展現了鄂圖曼上層較高的消費水平，且他們的消費也具有社會和政治目的。

西方學界雖已廣泛接受明朝具有消費文化，但對清朝和鄂圖曼帝國的了解仍然甚少，而且普遍以爲清朝的消費水平低下，認爲清廷和鄂圖曼不僅在諸多國策上「扼殺了」資本主義社會萌芽，而且還提倡節儉。[9]本書則是合眾人之力，推翻了這一論調，幫助學者更能認識清朝在東西大分流階段前後的消費水平，填補英文著作對清朝消費文化研究的空白。此外，本書也關注物品的研究意義與重要性，使得對於東方物品的研究不再是一座無人問津的孤島。

編者將論文依主題區分爲四大部分：遺產清單、都市生活、飲食文化及商品消費。第一部分有四篇文章，主要研究權貴家族的財產清單。鄂圖曼帝國和清朝上層家庭擁有的奢侈品種類雖不相同，但目的相似，多是爲了政治和社交。他們以消費來彰顯階級、權力與文化品味。譬如雲妍探討閩浙總督陳輝祖的抄家清單，其中既有昂貴的皮毛與洋貨，也有很多盛行已久的漢人傳統奢侈品。她認爲陳輝祖的家產和別的官僚以及皇室相似（頁 81）。而據 Amanda Phillips 的考察，作爲蘇丹軍中高級將領，Ali Paşa 在首都家中擁有本地傳統奢侈品和舶來品，相似的奢侈品也出現在他的同僚家中（頁 111-112）。Yildiz Yilmaz 對於餐具的研究，也指出奢侈品在權貴社交中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可見，鄂圖曼帝國和清朝的上層階級消費理念極爲相似：爲了躋身特定階級而消費特定的奢侈品。

上述作品詳細地分析了權貴的個別家產，但未比較更多不同社會階層的財產清單，也未指出兩國抄家制度上的不同對上層消費風氣的可能影響。遭受抄家之人大多是因觸犯法律，例如貪汙、觸刑、虧空，或是因爲文字獄的緣故。[10]據賴惠敏的統計，抄家在乾隆年間帶給清廷的收入只佔很小的比例。[11]而在鄂

9 劉鳳雲，〈觀念與熱點的轉換：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與趨勢〉，《清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頁 48。

10 雲妍，〈從數據統計再論清代的抄家〉，《清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112-115。

11 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頁 143-145。

圖曼帝國，抄家不僅僅是政治工具，還是一種軟性的稅收制度。帝國官員和上層階級去世後，貴重物品也會因此被挑選入宮。[12]這顯然會影響鄂圖曼權貴的消費心理，他們會擔心購買的物品被沒收，引來無妄之災，無法被後裔繼承。

Selim Karahasanoğlu 的文章可說佐證了這樣的心理。根據艾哈邁德三世蘇丹（Sultan Ahmed III）的大維齊爾 Nevşehirli Damad İbrahim Paşa 歷年的收支數據，早年他的支出佔年收入的 80%，而晚年只佔 50%，可見鄂圖曼帝國的上層階級並未如後人想像的那樣揮霍無度，也未曾經歷所謂的「鬱金香時代」（頁 140-141）。鬱金香是當時備受上層喜愛的花卉之一，歷史學家以此將 1718-1730 年稱爲鬱金香時代，用以形容鄂圖曼宮廷和社會對於奢侈品的癡迷（頁 134）。

書中第二部分收入四篇文章，側重分析城市生活，其中兩篇分析了四川省巴縣的竊案和江蘇省揚州市的園林別墅。巫仁恕和王大綱用 500 多起竊盜紀錄來展示巴縣中人之家（資產在 50 至 1,000 兩白銀）的消費水平：失竊最多的是各類衣服，其次是貴重金屬器物與首飾，然後是鞋襪、牲畜、布料、日用品、一般穿戴飾品及配件、食物、帽件、工具，另有不少舶來品和江南盛行的物件（頁 197-199）。雖然在某起案件中被偷物品的價值較高，相當於清代工匠藝人一到兩個月的薪水，但從失主的陳詞來看，他們並不覺得貴重，反映出四川的中人之家也有消費奢侈品的能力（頁 209-211）。不過就像作者所指出的，偷竊清單有其侷限性，不會記錄一些難以銷贓或搬運的物品。即便如此，這些細軟物件也足以證明巴縣的消費風尙。

安東籬（Antonia Finnane）對於揚州宅邸的研究則是彰顯了中上階級的消費文化。她重點分析了揚州的建築風格，同時特別指出商人的消費風氣在清朝前中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不少清朝筆記小說都描寫揚州鹽商的衣食住行皆極盡奢靡之能事，如起高樓、好宴飲、歌舞徹夜，日常起居毫不節省，連小費都

12 Yasin Arslantaş, “Confiscation by the Ruler: A Study of the Ottoman Practice of Müsadere, 1700s-1839,” (Ph. D. thesis,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7), p. 7.

是從千兩銀子給起。[13]

四川和江南兩地雖然相對富裕，但仍無法代表整個清帝國。據彭慕蘭所證，江南的經濟發展與工業革命前的英格蘭不相上下。[14]以蘇州爲例，這裡是整個清朝生產和消費奢侈品的中心，不僅設有織造局，更是百貨所聚之地。蘇州的商人甚至將乾隆時期高撲私採玉案中的 2,800 斤雲南官玉成功銷贓。[15]至於四川，據雲貴總督張允於 1747 年隨奏稱巴蜀乃「天下沃野」。[16]早在東漢末年間，四川的蜀錦就是昂貴的奢侈品。[17]儘管四川和江南不能代表整個清朝的消費水平，但這些證據足以引起學者的注意，重新審視清朝消費緊縮的傳統觀念。歷史學家未來應繼續研究更多地區，不應止步於江南與四川。

另外兩篇由土耳其史家 Suraiya Faroqhi 和 Colette Establet 所撰寫的文章，分別研究鄂圖曼帝國的女性和大馬士革城中低階層家庭的消費。伊斯蘭和基督教的法律不同，允許女性買賣與繼承財產（頁 213），因此地方法院存有大量以女性爲主的交易和繼承的文件。Faroqhi 從中發現女性家中有絲製品、半成絲質品以及家具裝飾（頁 225）。作者坦承這些清單證據有其侷限，並不能證實絲織品的用處，只能證明女性擁有這些財產，故女性家中並不是一無所有的狀態。Establet 則運用 1700 年左右的 121 份財產清單，再次顯示女性的消費潛力。作者發現其中窮苦人家平均擁有大約 140 樣物品（頁 239-240），而首飾佔據總價值的四分之一（頁 243）。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紀錄也可能只是暗示女性利用首飾來儲蓄資產。

在大馬士革城相對富有的家庭中，舶來品很常見。不同於傳統的認知，這裡的舶來品並非來自歐洲，而是來自亞洲及鄰近海灣（頁 248）。一些東方舶

13　例如：余懷，《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4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m World Economy,* pp. 1-10.

15　黃敬斌，《民生與家計：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第一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冊 1，頁 406-407。該案件調查經過的奏摺詳見，頁 373-937。

16　轉引自張研、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臺北：雲龍出版社，2003），頁 68。

17　趙豐，《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2），頁 57。

來品的價格也不似想像中的昂貴，例如中國的瓷器（頁 249）。簡言之，以城市生活爲主題的這四篇文章，挑戰了傳統史觀中東方消費力下降和女性消費比重相對低的觀點。再從舶來品的消費，反映當時全球化消費現象在鄂圖曼帝國和清朝的中上階級中也確實存在，歐洲並非特例。

第三部分收錄三篇文章，討論飲食文化對日常生活和政治的影響。Arif Bilgin 指出全球化對鄂圖曼帝國食材的影響。美洲「新大陸」蔬菜被西班牙和哈普斯堡王朝傳播到了伊斯坦堡，舊世界的食物如橘子、朝鮮薊、秋葵也加入他們的食譜中（頁 281-282）。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同樣指出清朝皇室和上層重視飲食文化。明清不僅是奢侈品出口國，但其本身也是消費大國（頁 284）。明朝興起的奢侈飲食風氣延續至清，不同的是，清朝皇室視消費爲鞏固權力的一種方式，如乾隆帝積極參與其中，他與漢地知識分子互相影響，促使清朝形成了融合的飲食文化（頁 291-292）。在清朝，飲食文化與政治權力和階層相關。張勉治（Michael G. Chang）指出清皇室以宴會來鞏固官僚階級體系。他仔細地對比康熙宴請的官員和將領名單與他們之後的貢獻，發現幾乎所有宴會都會帶來群體劃界，康熙藉此來強化與擴大支持靠攏他的群臣網絡（頁 309）。作者的對比出發點很有創意，但他的分析僅揭示了兩者的相關性，尙不足以證明因果關係。從統計的角度出發，應該先分群體、進行樣本控制，再做比較。例如可以將官員分爲在康熙登基前或登基後與其產生關係者，再分析兩類官員入宮進餐的頻繁程度與其對朝廷貢獻的關係。

本書第四部分有五篇文章，研究商品及其相關文本：黃銅、皮毛、字畫、譜錄、鑽石和磚瓦。這些研究從另一個視角展示了消費文化的興起。賴惠敏和蘇德徵著重探討黃銅對於清朝的影響。清朝的黃銅冶煉技術和製造工藝超過歐洲，領先全世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皇室及貴族對於黃銅的喜愛和應用（頁 334-335）。清帝利用黃銅建造宏大佛像，亦在黃銅鑄成的牆壁上雕刻佛像，試圖將政治中心首都北京和承德的避暑山莊建立成西藏之外的藏傳佛教聖地。清帝還會饋贈來訪者黃銅佛像，以此籠絡新疆、蒙古和西藏信仰藏傳佛教

的部族。例如在 1764 年，乾隆饋贈達賴喇嘛黃銅鼻煙壺與黃銅五貢。朝貢者對黃銅製品的喜愛源於其色如金，且經久耐用。如同皮毛逐漸傳入民間成爲流行時尚，黃銅亦然。其間，陝西商人起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頁 342-346）。

Elif Akçetin 用當鋪手冊探討清朝的皮毛消費，不僅展示了皮毛在中上家庭消費的重要性，還指出毛皮的奢侈品在清朝具有儲值和提現的功能。在當鋪手冊裡，老板雖然對皮毛的產地一筆帶過，但卻細緻地區分花紋與取材部位，證明了皮毛在當舖業的廣泛流通。就像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一書所言，滿族的統治促使皮毛成爲清朝文化的一個象徵，並更廣泛地爲人們所用。[18]譜錄如同清朝的當鋪手冊一樣，生動展現了文人士大夫對藏品的癡迷。Martina Siebert 統計自唐以後的存世譜錄，並對其進行分析。其中，記錄古董者 120 本，物品 94 本，文房 157 本，各類譜錄總計 1,187 本；清人撰寫了 542 本，明朝 352 本，宋朝 224 本（頁 388）。歷代譜錄逐漸增多，雖然可證明物品文化逐漸興盛，但也可能是因清朝距離現代更近，所以遺留下來較多的書籍。不過，這一數據至少證明了一點：清朝和此前漢人統治的朝代一樣，有著同樣繁盛的商品文化。此外，譜錄也被收集在乾隆下令編纂的《四庫全書》中。譜錄和當鋪手冊二者皆間接地展示了清朝商品文化的發達。而精通奢侈品所需的大量知識，說明了奢侈品成爲階層的象徵，遂有人意圖用消費來跨越階級。

Hedda Reindl-Kiel 和 Edhem Eldem 通過研究鑽石和磚瓦揭露鄂圖曼帝國上層的消費情況。在當地，鑽石就如同清朝的東珠，是一種象徵權力的貴重裝飾品。Hedda Reindl-Kiel 研究軍事領導人、大維齊爾 Merzifonlu Kara Mustafa Pasha 受絞刑後的抄家清單，從中看出鄂圖曼帝國的上層貴族把大量鑽石鑲嵌在衣服首飾和槍支上。在這些鑲嵌鑽石的物品裡，有不少刻有“vüzeraya mahsus”字樣，意爲「只爲維齊爾」，表明是蘇丹給予維齊爾級別大臣的賞賜贈禮。不同於清朝皇帝嚴格限制採集的東珠，鑽石在鄂圖曼帝國是一種貴重商

[18] Jon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the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品。據 Evliya Çelebi 在 1638 年的記載，伊斯坦堡一地有 600 位活躍的珠寶商人（頁 429）。雖然不能完全證實數字的準確性，但可見伊斯坦堡的確有特定商人在供應和銷售鑽石。論文中的主角 Merzifonlu Kara Mustafa Pasha 擁有驚人的珠寶消費實力，這與他擁有的政治權力和商人關係息息相關，因此我們不能假設其他人也擁有一樣的管道和權力能獲得鑽石珠寶。

Eldem 關於磚瓦的研究，從另一角度展示了 Mürefte 地區（今 Şarköy 城）居民對於房屋裝飾的熱愛。作者所研究的 68 塊磚頭和 19 塊屋瓦，是由拜占庭時期就居住於此、信奉東正教的羅姆人（Rum）生產的。1880 年後的三十年內，磚瓦出口總額增長了兩倍有餘，從 10 萬噸增長到了 24 萬噸。1900 年後的十年裡，磚瓦總產量從 27 萬噸增長到 38 萬噸，遠銷至法國、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西班牙、義大利和埃及等地（頁 436）。然而這些磚瓦最大的買家是鄂圖曼皇室。1910 年代以後，民族衝突和戰爭導致磚瓦的生產逐漸消亡。曾經盛極一時的繁麗磚瓦揭示了鄂圖曼帝國消費的多元化，這對清朝消費研究極具啓發性：清朝也是一個多元文化政權，是否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也像羅姆人一樣，擁有自己的消費文化？而各個族群的文化是否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融合？

本書囊括了基於不同史料的十八世紀鄂圖曼帝國和清朝消費風氣研究。雖然某些篇章的例子和地域較爲特殊，但幾乎每一篇論文都呈現出兩個帝國複雜而豐富的消費文化。不僅是權貴階級消費奢侈品，中人之家也如此，比如四川巴縣偷竊紀錄的結論，黃銅和皮毛在清朝中上層階級的興起。中上之家消費奢侈品的原因，除了個人喜好外，很大一部分是爲了躋身上層文化圈。土耳其的歷史學家指出文化認同在官場的重要性，賴惠敏的諸多專書和土耳其歷史學者的研究也佐證了皇室在消費文化中的領導地位。即便清朝在早期頒布了嚴格的消費制度，但其約束力在乾嘉年間開始消退，更多富裕的人和官商能夠越界消費奢侈品。這些研究也質疑了清代皇帝提倡節儉之風的作用。本書提供了豐富而有力的證據，可讓我們重新審視兩個帝國的消費史，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遷。